

“转型期的敦煌学——继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明成满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 “转型期的敦煌学——继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9月7日—11日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这次会议共收到论文51篇,与会的60多名敦煌学专家围绕敦煌文献的考释、唐五代宋初敦煌政治经济史、敦煌宗教史和敦煌文学等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将大大促进转型期的敦煌学研究深入发展。

关键词: 转型期; 敦煌学; 研讨会; 综述

中图分类号: K87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245(2007)01-0024-05

由南京师范大学、日本京都大学、台湾南华大学、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联合举办的“转型期的敦煌学——继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9月7日—11日在南京师范大学隆重举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羨林先生向大会发来贺词。大会的中心议题主要是讨论如何努力改变过去比较零散地研究敦煌文献资料的状况,在宏观把握敦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实现敦煌学以继承与发展为主题的创新与转型。国内外60多位敦煌学专家参加了这次会议。学术讨论之外,与会代表还观看了有关潘重规先生的影像资料,以纪念潘先生诞辰100周年;并参观了南京博物院和江南贡院等名胜古迹。大会共收到专家论文51篇,从提交的论文来看,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宗教学、历史学、文学、民俗学、天文学和外交等领域,显示出敦煌学多领域、跨学科的新研究趋势。这些论文大致可分为敦煌文献的整理与考释、敦煌宗教和民间信仰、唐五代宋初敦煌历史和敦煌文学等几个方面,现将会议论文内容简要介绍如下。

一、敦煌文献的整理与考释

(一) 佛教文献

赵和平的《武则天为已逝父母写经发愿文及相关敦煌写卷综合研究》将三篇保存于敦煌写本中的

佚文加以整理、复原、论证,确认这三篇佚文的作者均为武则天。他探讨了由整理这些佚文引出的一些相关问题,理清了咸亨至仪凤年间这批保留于敦煌石室中的宫廷写经的来源,基本搞清了在长安太原寺宫廷抄佛经的详细运作情形,并对武则天与宗教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洛合俊典的《敦煌写本和日本古写经中的玄应撰〈一切经音义〉》分别研究了敦煌写本和日本古写经中的《一切经音义》,对两者作了比较。他的研究为其他学者从宗教学的角度研究《一切经音义》奠定了基础,也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唐代初期一切经的形态。玄幸子的《关于两种佛说八阳神咒经》通过研究P.3915号文书,比较了敦煌文献中的两种《佛说八阳神咒经》,考证了真经和疑伪经之间的关系,弄清了自唐末到五代在敦煌社会里佛教文化如何受容。

梁丽玲的《敦煌写本〈十梦经〉初探》研究了敦煌写本中的两件《十梦经》,对两个写本都进行了录文,比较了两者的形式和结构、内容特色和性质,并说明了敦煌写本《十梦经》与佛典及解梦书的关系,认为这两件写卷属同一系统。衣川贤次的《敦煌写经校订大正藏当议》通过校对《法句譬喻经》和《维摩诘所说经》,认为敦煌写经与日本写本的一切经大致都可视为刊本以前的写本系统,两者都可作为校订《大正藏》的重要校本。汪娟的《敦煌写本法华七礼文残本考释》对敦煌文书中编号为北7218v

收稿日期: 2006-11-03

作者简介: 明成满(1969-),男,江苏南京人,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专门史专业2005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敦煌寺院经济研究。

(芥81)号文书中残存的三礼进行文字厘定,对其形式结构、经典依据、思想内容等方面进行讨论,并且与智顗所撰《法华三昧懺仪》进行比较,忠实地呈现了中古时期法华信仰的一个侧面。竺沙雅章的《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的版刻汉文大藏经本》考证了近年在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的十余件版刻大藏经的残卷。他推测,这些残片出土的场所并非藏经之地,而是僧侣居住的禅窟和礼拜窟。从源头上说,这些佛典是在辽金或宋元时代的江南作为大藏经开版后再运到敦煌的。由此可见,藏经洞封闭之后,自东方至于敦煌的汉文佛典的传布也没有中断。

朱雷的《敦煌写本〈庐山远公话〉中之惠远缘起及〈涅槃经〉之信仰》认为话本中惠远的原型来源于三名高僧。三名高僧中惠远和竺道生在庐山圣地修行,“小远”未尝入庐山,但为《涅槃经》作疏,也有较高的威信。于是三者揉合起来成了《庐山远公话》中之惠远和尚的缘起。赤尾荣庆的《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大谷探险队带来写本介绍》概述了在京都国立博物馆中发现的五件敦煌写经的规格、纸质、外形,考订了它们的年代。他认为“国际敦煌项目”也许会导致敦煌学中“古文书学”、“古写本学”之类接触实物进行研究的领域弱化,而这个领域是构成凭籍文献进行研究的学问基础。刘曼春的《继续研究敦煌莫高窟〈宝雨经变〉》在史苇湘先生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探讨《宝雨经变》,考察其中蕴含的民主精华和人文精神。她认为《宝雨经变》表达了尊重妇女和男女平等的人类文明进步的思想,体现了佛教普济众生、平等载育的思想;凭借经文和经变,可以反映武则天统治时期酷吏专制法权;经变再现了唐初农业文明,再现了佛教哲学和宗教改革。

(二) 其它文献

荣新江的《追寻最后的宝藏——李盛铎旧藏敦煌文献调查记》认为原藏李盛铎而现藏日本某氏的李氏旧藏敦煌文献,可以说是敦煌文献最后的宝藏。为了追寻这批宝藏,荣先生探访了日本“羽田亨纪念馆”;查阅了《敦煌密笈目录》和《日本羽田亨收藏李木斋(盛铎)旧藏敦煌遗书目录》,获得了一些线索。他还公布了《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研究索引稿,为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波波娃的《唐高宗天训与中国政治传统》提供了P.5523唐高宗《天训》的录文,考察了《天训》出台的时代背景,认为其内容和结构与唐初皇王的家训属于同类。辻正博《英藏S.9478地志残片浅析》考察了S.9478残片的内容、编撰年代的上限、与现存地理类书籍及在敦煌发现的佚存地志的关系。他认为

S.9478是反映天宝年间地理的写本,并进一步推测它可能是敦博76《地志残卷》所据天宝年间资料的残片。敦煌遗书中的儒家九经多为六朝及唐五代抄本,在经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许建平的《敦煌经籍写卷的学术价值》认为敦煌遗书中的儒家九经具有辑佚、校勘、文字学、音韵学和版本学等多方面的价值。

束锡红在《英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与吐蕃早期文化》通过对英法所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的情况分析,综述了国际藏学界对吐蕃早期文字与文化的研究成果,评述了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长处和不足。她认为全面研究、整理、出版现存于英国、法国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必将对我国古藏文、敦煌学和吐蕃社会的研究有无可估量的意义。

二、敦煌宗教和民间信仰

(一) 佛教史

李正宇的《重新认识8至11世纪的敦煌佛教》认为,敦煌世俗佛教是8至11世纪敦煌地区形成并流行的入世合俗的佛教。他阐述了敦煌世俗佛教的性质、特点,认为敦煌世俗佛教涵盖社会各阶层,成为当地佛教的主流。他认为敦煌佛教诸宗皆奉,不专一宗。他还对敦煌佛教的研究方法和思路进行了反思。对敦煌愿文的研究历来偏重于文献的考证、愿文名称的定义、愿文类型的分析,而对愿文内容研究甚少。依空的《敦煌佛教愿文探微》研究了敦煌愿文的类型、敦煌佛经题记愿文,认为敦煌愿文主要以现实禳灾祈福为目的,充满功利性和世俗性。所以从敦煌愿文也可看出佛教在敦煌具有世俗化的趋势。

郝春文的《再论北朝至隋唐五代宋初的女人结社》认为多数敦煌女人社是有佛教信仰的兼行佛教活动与互助活动的民间团体,也有一些是从事单一佛教活动的女人社。他分析了在男尊女卑的社会,女人社在中国广大地域流行了450多年的原因和意义。过去学者认为社员由婢女组成,郝春文则认为这一时期妇女地位较高,而社员也应为家中地位较高的妇女。他认为不能拔高女人社流行的意义,她们只不过是佛教歧视女性信徒的文化诱导下,在比丘尼僧团的启示下组织起来的同病相怜的女性而已。在汉传佛教中,观音信仰最为风行且最具特色。敦煌文献与石窟中,保存了大量有关观音信仰的材料。郑阿财的《传播、诠释与接受——敦煌文献

与石窟 观音经 之考察》主要利用相关的汉译佛典、注疏、灵验记、中国撰造经典(疑伪经)和讲经文等文献,并结合石窟中的观音经变,从文字、图像及口头三个方面来考察大乘佛教观音像在中国的传播、诠释与接受的种种现象及相关问题。

方广钊的《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新发现四件中国早期印刷品》研究了敦煌佛教的S.11287印花经纸、S.10979木刻护首经名签和S.11645木刻折装佛经,认为这三种中国早期印刷品对研究中国印刷史有很大的价值。他认为,在敦煌遗书中发现刻本经折装佛经,对“藏经洞的封闭时间”、“木刻经折装佛经的产生年代”等问题的传统认识产生了冲击。马德的《敦煌吐蕃文献的新论》对敦煌藏经洞出土的藏文文献(敦煌吐蕃文献)的数量、收藏情况、文献内容等几个方面的价值、意义作综述性介绍。他还考察了敦煌藏文写经中的一大批报废经页,这些经页记载了敦煌吐蕃时期的写经、校经、写经生及校经师队伍、写经管理、纸张使用、废弃经文处理等一系列问题,展示了当时佛教在吐蕃统治区内的传播与发展、佛教对当时的影响等方面的社会问题。张涌泉的《俄藏敦煌18974号等十余件字书碎片缀合研究》通过考释《俄藏敦煌文献》第十七册305页至326页的十余件字书碎片,认为这些碎片是同一《大方广佛华严经音》的组成部分。进而他考证《大方广佛华严经音》有可能是宋代以后的产物,原卷也可能并非藏经洞之物,而是莫高窟其他洞窟的文献或黑水城文献混入的。克拉拉的《哈萨克斯的佛教——现代和当代》回顾了18世纪佛教传入哈萨克斯坦后的发展状况,并介绍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外国佛教传教士在该国传播佛教的情况。

(二) 道教和民间信仰

刘屹的《道教仙人“子明”论考》考察了敦煌道教写本中出现的道教仙人“子明”,认为敦煌道经《昇玄经》和《太极经》中的奚子明,应该就是汉晋仙道传统中的陵阳子明。上述两经中的奚子明靠恪守道戒、探究重玄义理而得以成仙,和汉晋时代的修仙方法有很大的不同。“子明”的名号、形象和活动地区的演变,反映了汉晋隋唐间,道教从重道术向重经教发展演变的一个侧面。万毅的《敦煌本 昇玄内教经 与南朝末期道教的“三一”新论》研究了敦煌本《昇玄内教经》中的“三一”论,认为和以前道教如上清派经典中的“三一”观念相比,它神人感应的谶纬色彩淡化,智慧解脱的理性因素上升,这也从一个方面折射出中古时期的中国人摒弃巫术、摆脱愚昧、追求超越精神境界的艰辛跋涉历程。

黄正建的《试论唐人的丧葬择日——以敦煌文书为中心》认为唐朝人在选择葬日时使用多种方法。这些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利用《俱注历》查找,另一类是利用《阴阳书》或《葬书》来选择,利用葬书来选择可能更为普遍。周西波的《敦煌文献中之逐盗求失物方术略考》通过考察敦煌文献保存的内容,认为此类方术采用的方法大致有两类。一是通过划分区位的图形,以顺数和逆数的方式来达到预测的结果。二是以五行与天干、八卦等象征意义的转换,来掌握盗者的情形。

三、唐五代宋初敦煌历史

(一) 政治史

冯培红的《关于归义军节度观察使官印问题的一些补充》在日本森安先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若干讨论意见,作为森安先生研究的一些补充。此文探讨了关于“河西都防御使印”、“河西(道)节度使印”、“沙州节度使印”、“沙州观察处置使之印”、“归义军节度使新铸印”、“瓜沙等州观察使新铸印”、“归义军节度使之印”和“归义军观察节度留后印”等印章的有关问题。吴丽娱的《试论敦煌书仪中的官场起居仪》以敦煌官场书仪为考察对象,认为起居仪本因儒家提倡孝道的家礼而产生,但是随着官僚社会的发展和朝仪的下僭,在晚唐五代的藩镇社会以及官员之间得到广泛的运用,成为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都竞相使用、模仿的一种官牒,影响人们的世俗生活,改变人们的习惯和思想。

杨宝玉的《张议潮束身归阙后与沙州人士的往来》考察了P.3730v、S.6405v两件文书的有关问题,认为张议潮束身归阙后与沙州上层人士继续交往,并让随侍身边的子侄与他们密切往来,这可能对张淮深执政后敦煌政局的动荡产生了一定影响,甚至张淮深及其家人被杀也与此有关。过去学者们多注意到曹议金执政时张保山、梁幸德出使后唐的史实,而对在张承奉时期张保山的出使鲜有论及。杨秀清的《P.3518 张保山邈真赞 札记》认为张承奉时期张保山出使唐朝是在天复元年(901)秋冬之际;在长安时,昭宗皇帝授予他右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一职。孙继民、陈瑞青的《论藏异国的宋代鄯延路经略安抚司档案》将在灵石与黑水城出土的鄯延路经略安抚司档案结合起来,考察了俄藏黑水城文献的来历,提供了俄藏和在灵石县发现的鄯延路经略安抚司档案的录文及其内容介绍,并通过这些档案研究了南宋初年陕西、河东地区的抗金形势。

(二) 社会经济史

刘进宝的《x.2419号 欠柴人名目 中的徭役与赋役蠲免》通过考释相关敦煌出土文书,并结合传世文献中的有关史料,为归义军经济史的研究书写了新的一笔。他认为归义军时期的酒户在为官府承担酿造任务时,可免除其它徭役;烽子在上番执役时免除其承担的赋税;厅子和堂子由于承担了官府中厅堂的洒扫等劳役,便免除了其应缴纳的税柴。邓文宽的《跋敦煌文献中的两次日食记录》首次揭出了敦煌文献中公元834年3月14日、公元846年12月22日的两次日食记录,可补其它历史典籍中记载过于疏漏的这两次日全食的发生时刻。

金滢坤的《论唐五代宋元的社条与乡约》从敦煌社条、《吕氏乡约》、《陇祠乡社义约》的结构、内容、性质等角度探讨了唐五代宋元乡村私社与乡约的关系,并分析了在这一时期乡村民间组织的转变和社会互助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乡村的乡民、乡绅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论及了国家控制乡村与乡村自治等相关问题。郑炳林的《晚唐五代敦煌社会风气之胡风胡化》认为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晚唐五代归义军政权管理下的敦煌是一个多民族居住区域。在这一地区胡人保留了相当多的胡风,汉人在同敦煌当地居住的少数民族共同生活中,接纳了一些胡人的风俗习惯,表现出一种胡化倾向。这种倾向对敦煌地区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倾向有利于接受优秀的外来文化,有利于灿烂辉煌的敦煌佛教艺术的创造。李重申的《敦煌莫高窟遗存的角抵图像考析》研究了莫高窟遗存的角抵图像,认为这些图像都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它们形象生动地把当时盛行的角抵、相扑和散打等运动表现得淋漓尽致,为研究从蚩尤戏到角抵、相扑和摔跤的历史演进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他还认为角抵运动兴盛是由于世俗文化与宫廷文化交汇,本土文化与敦煌文化融合的结果。

四、敦煌文学

柴剑虹的《转型期敦煌文学研究的新课题》在概要总结八十多年来敦煌文学研究的主要成就与特点、倾向的基础上,以敦煌藏经洞所出诗、赋、曲子词、小说题材的作品为例,提出在转型期敦煌文学研究的新课题是:从文学史观出发,将敦煌文学作品汇集后真正置于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考察;从文化史观出发,将敦煌文学真正置于敦煌历史文化的人文环境中研究;从文本内容与形式着手,去探

讨敦煌文学作品的艺术性特点,让敦煌文学研究真正实现“回归文学”的目的。

张鸿勋、张榛的《移植与变异:日本 酒茶论 与敦煌 茶酒论 的比较研究》从故事类型、叙事口吻、故事背景、故事内容和语言风格等方面对日本《酒茶论》与敦煌《茶酒论》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在差异中存有许多相似之处,并从两千多年来的中日文化交流历史方面寻找了二者许多方面相似的原因。梅维恒的《欧亚鸟类对话作品的比较》比较了包括敦煌写本《百鸟名》在内的四种鸟类对话作品,注意到他们在鸟类聚会的描述上有惊人的相似,指出描写鸟类聚会的背后有政治目的,并认为四篇作品的作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印度动物寓言作品的影响。朱凤玉的《敦煌蒙书 古贤集 与中晚唐代咏史诗》考察了敦煌蒙书《古贤集》中的咏史诗因素、类书因素和民间历史意识因素,认为它融类书、咏史诗于一炉,成为民间历史知识的主要来源,在民间发挥了正史与高文典册所不及之影响力,主宰民间百姓的历史观。董志翘的《辑注本 启颜录 商补》在黄征《辑注本 启颜录 匡补》一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辑注本《启颜录》进行商补,举出该书校点、注释可商补者有25条,对每条进行了重新校注。

张先堂的《净土教宗师范照的文学创作及其对唐代文学的贡献》认为范照是唐代一位有代表性的诗僧,他创作过一些近体诗,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此文重点探讨了他创作、编集净土五会念佛赞文的情况,认为这对于唐代佛教赞文的成熟与发展,对于推动唐代佛教文学创作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敦煌歌曲是敦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林仁昱的《论敦煌联章歌曲列举事项的方法》以联章歌曲列举事项的方法为探索对象,认为敦煌联章歌曲列举事项的方法其实就是联章歌曲布局的方法。他还认为其中的各种设计与安排对于跨时代的联章歌曲研究也将提供许多可参考的线索。荒见泰史、桂弘的《转型期的变文研究——以日本变文研究的特征为中心探讨》,通过总结日本的敦煌变文研究特征,对转型期的敦煌变文研究提出了一些看法。

汉字在演变过程中的整体走向是趋于字形简化的,但繁化在汉字史上也占着一席之地。蔡忠霖的《敦煌俗字中的繁化现象试析》以敦煌写卷中的繁化俗字为研究对象,进行学理分析与探究。他认为借此可以进一步了解俗字中的繁化概况,对繁化俗字的孳乳提出看法,为俗字的演化提供较为持衡而完整的探讨。《解释歌义壹备》1909年被发现后,除了聂鸿音和孙伯君师徒外,别无他人研究。王三

庆的《解释歌义壹备 新探》通过翔实的史料, 严密的考证, 提出了一些和前人不同的看法。

五、其它相关研究

陈国灿的《略论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中的史学断代问题》认为处于转型期的敦煌学, 文书断代问题仍然是需要各学科关注的问题。他指出在对文书内容作全面透彻理解的基础上, 可以联系出土背景、书法或书风、不同时期的职官或法令制度、特定时期的特殊用词、文书正背面的关系等方面来确定文书的年代。除敦煌学的故乡甘肃省和敦煌学重镇浙江省、北京市, 江苏是敦煌学人才最多的省份。黄征的《江苏与敦煌学——人物篇(1908—2006)》搜集了江苏著名的敦煌学家和敦煌学一般研究者的资料。这些江苏敦煌学研究人才从籍贯上看可分为

两类, 一类是江苏籍的, 另一类是在江苏生活过的。陈明的《“好热细药”: 于阗医药文化钩沉》认为于阗的医药思想与医疗接受了来自印度、中亚、中原等地的成分, 形成了一种带有综合色彩的医药文化。由于于阗在吸纳印度生命吠陀的时候常将印度佛教的一些因素混融其中, 这促进了印度医学在中亚和敦煌的传播, 使得于阗和敦煌有非常密切的医药往来。

敦煌学作为“一代学术之新潮流”的“显学”至今已有百年历程。目前, 由于中国学术界、出版界的努力与国外收藏敦煌文献机构的协助, 绝大多数流散海外的敦煌文献资料已正式刊布, 这样不论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 还是在研究内容、方法及研究主体方面, 敦煌学研究都面临着新的转型与发展机遇。这次会议必定会促进转型期的敦煌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Study of the Dunhuang caves of transformation period: Inherit and develop”,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eminar summary of study of the Dunhuang caves

MING Chengman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city, Jiang Su, 210097)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f study of the Dunhuang caves that is named “Study of the Dunhuang caves of transformation period—Inherit and develop” holds i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from 7th. September to the 11th. September, 2006. This meeting receives 51 articles together. More than 60 experts of the study of the Dunhuang caves participate in the conference. They launch the warm discussion around researching and throwing light on Dunhuang literature, political economic history of Dunhuang during Tang, Five Dynasties and the Early Song, Dunhuang religion history, Dunhuang literature. The meeting will promote the research of the study of Dunhuang of transformation period to deepen development greatly.

Key Words: Transformation period; Religion of Dunhuang; Seminar; summary